

與西方文化現象的疊合。面對時下備受關注的媒體傳播問題時，該書在博德利亞 (Jean Baudrillard)、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人的論述之後繼續推進，闡釋第三世界媒體所必須具有的「反霸權空間」意識，對多元價值中的媒體神話加以深省。

就像中國文化精神往何處去是每一個不曾忘卻歷史創傷的知識份子都嘗試求解的難題一樣，所有論述中國文化的著作都無法迴避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再鑄民族精神的問題。《中國鏡像》同樣處在後現、後殖語境裏為中國文化進行定位和為新世紀中國文化爭

得話語權的焦慮中。如何對傳統文化進行轉型性創造和批判性重建，如何引進話語機制，啟動母語文化的僵化狀態並防止東方文化精神的失落，如何在科技神話、現代化神話、經濟金錢神話中、在西化和跨國資本的參與中、在權力對經濟的介入中設立合理可行的預定目標，都是該書的憂懷所在，需要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和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的二元對立中審慎考慮。然而，「一種注重『社會資本』的具有文化精神信仰底蘊的『價值文化』」(頁396)，正在《中國鏡像》折射出的心性光輝中漸生漸長。

就像中國文化精神往何處去是每一個不曾忘卻歷史創傷的知識份子都嘗試求解的難題一樣，所有論述中國文化的著作都無法迴避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再鑄民族精神的問題。《中國鏡像》同樣處在後現代、後殖民語境裏為中國文化進行定位和為新世紀中國文化爭得話語權的焦慮中。

體制內的革命

● 淮 茗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1905年成立的學部雖然是個短命衙門，僅僅六年時間就隨着滿清王朝的退場而成為歷史陳迹，但是它的出現卻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無論是其表面的象徵意義還是其內在的歷史意蘊，說它是打開晚清政治、教育、文化之門的一把

1905年成立的學部，雖然僅僅存在了六年就隨着清王朝的退場而成為歷史陳迹，但是它的出現卻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說它是打開晚清政治、教育、文化之門的鑰匙，也並不為過。它的成立、演變既是晚清政治變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教育、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

鑰匙，也並不為過。它的成立、演變既是晚清政治變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教育、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因而對其進行專門的研究是必要的，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晚清學部研究》一書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也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晚清學部的著作。其選題的重要價值不用多說，它的選題、研究思路及具體操作方式都代表了近年晚清歷史研究的新趨勢。隨着近年晚清歷史研究的深入，以往研究中對革命神話般的歌頌已逐漸變成理性的思考，研究者對晚清的新政改制也從一味批判變為冷靜關注，這種從熟視無睹到正面探討的轉變不僅可以解讀成眼界視野的開闊，而且也意味着觀念的深刻變化。對晚清歷史日益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我們對以前被有意塗抹的歷史真相有更為明晰的了解，同時也讓我們聯想到歷史演變的另一種可能，即在暴力之外、體制之內革命的可能。儘管歷史是不能作文學般的假設，但這種基於歷史事實的假設並非想入非非，畢竟中國近代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充滿了太多的遺憾和偏差，而且這種假設可以加深我們對社會變革的理解，應該說它還有一些現實意義，因為當今的時代潮流是穩定代替變亂，對話代替對抗。尤其是政治家在進行社會改革時，如果不是純粹出於私心的話，必須要考慮社會成本和民眾的承受能力，因而妥協調和並不

一定就意味着頑固和保守，改良派也不一定非要畫上丑角的臉譜。如果從這個角度反觀世紀初的歷史進程，我們不能不進行一連串的假設。體制外的暴力運動固然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但體制內的革命應該說也不是一種最壞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壞的選擇。對晚清的新政，學界歷來持批評和否定態度，滿清政府的改革出於被動，而且時刻不願放棄權力，以新政的名義不斷變換花樣維護皇權，時走時停，猶猶豫豫，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但是，為歷史潮流所推動，為社會新生力量所推動，它的新政也確實有一些新的實質內容，畢竟是在向現代化的旅途上邁步，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科舉的廢除、學部的成立就是明證。武昌舉義的前夜，正是清政府進行憲政改革的關鍵階段。很難想像，這一進程如果被打斷，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會朝着甚麼方向演進。畢竟在這個世紀裏，除了外族侵略外，社會內部的變亂和動盪使民眾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我們的父祖們是否有機會可以避免這些非自然性的災難呢？思考這一問題相信並不是多餘的。《晚清學部研究》一書研究的雖然只是晚清學部一個部門的變遷，但一葉知秋，從其提供的大量資料和翔實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晚清體制內革命的具體情況。從民國政府建立之初對晚清新政後政府體制上的一些沿襲可以看出，改朝換代並不能割斷歷史文化

的血脈，儘管這種承襲和延續經常被人為地忽視或遺忘。確實，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指向現實的答案，以避免社會變革中過高的社會成本，一個多災多難的世紀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能總是處於交學費的不成熟狀態。

筆者前面提到，對學部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從這一政府機構的設置、演變可以看出晚清實施新政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出近代教育的發展進程，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學術的轉型。作者的着眼點基本在歷史和教育，這和其所學專業有關。她對學部設立經過、主要職權、人事決策、權限關係、經費使用、內部管理及對近代文化事業的推進等方面進行了實證式的研究，彌補了此類研究的不足。該書的一個特色，是對制度體制變革的高度關注，並加以強調。應該說，這種關注本身就具有新意。以前學界的研究過於關注意識形態的演變，對制度層面的變化注意不夠。在晚清，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講的，觀念與實現往往有很大差距，甚至就是政府的命令也未必逐一得到實施，或實施時大打折扣，因此對當時的現實情況需要依據材料進行認真辨析。雖然制度層面的變化要慢於思想層面的變化，但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變化更為重要，因為它將觀念的變化用制度的形式具體落實，對社會發生實際的作用。以教育而言，中國傳統的教育一直

是建立在科舉的基礎上，不重視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訓練，更談不上全民的素質教育。到了近代，在困境反思和西學東漸的文化語境中，不少有志之士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響，提出了各種改革教育的構想。這些思想是有很大分歧的，但毫無疑問，其實際影響力的大小取決於在制度層面上得到的反應。隨着科舉制度的廢除，中國也按照西方的模式並根據國情再造教育。學部的建立就是從制度上對種種新教育思想的落實，保證新教育的實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的建立，使中國的學術研究從私人化轉向以高校為核心的公共化，從制度上保證了學術的發展，並培養了後備人才。進入民國後，雖然政府機構設置上改革較多，但在教育方面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前清的體制，只不過更為西方化而已，畢竟在近代教育的現代化進程中，有許多共性的東西，學部已經做過的，後來者就不一定非要從頭再來，再起爐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這些資源。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晚清學部研究》一書為學部及近代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術平台，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從近代學術文化轉型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還有很大的學術研究空間。如果以學部的研究為契機，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近代化進程進行切實研究，當會有更大收穫。

無可否認，滿清政府的改革出於被動，而且時刻以新政的名義維護皇權，但是，新政也確實有一些新的實質內容，廢科舉、設學部就是明證。武昌舉義的前夜，正是清政府進行憲政改革的關鍵階段。很難想像，這一進程如果被打斷，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會朝着甚麼方向演進。